



QIANSUIWAN SHANGHAI XING

冯天瑜 著

「千岁丸」上海行

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



商務印書館

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

主编 冯天瑜

“千岁丸”上海行

——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冯天
瑜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ISBN 7-100-03350-0

I. 千… II. 冯 III. 上海市-地方史-1862-史
料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337 号

本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QIĀNSUÌWÁN” SHÀNGHǎIXÍNG

“千岁丸”上海行

——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

冯天瑜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50-0/K·712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插页 1

定价: 24.00 元

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序

本书系由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文献的中译本和我们对此的研究论著组成。

日本自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以降,即十分关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状况,遂有 19 世纪 60 年代四次遣使上海之举。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开国”力度的激增,日本政要、学者域外考察成风,除访问欧美以求师法之外,也加强了对近邻中国的实地调查,官员、学者、浪人、商贾、军人竞相作“禹域踏查”(日本人习称中国为“禹域”,意谓“大禹的国度”;习称朝鲜为“箕国”,意谓“箕子的国度”),范围遍及白山黑水、戈壁草原、长江南北、大河上下,并留下卷帙浩繁的纪行文字,包含着观察、评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较成系统的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材料,以笔者阅览所及,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叶,高杉晋作、名仓予何人、竹添光鸿、冈千仞、安东不二雄、宇野哲人、内藤湖南等人的中国纪行日记和随笔,大体属于个人旅行调查。日本尤玛尼书房于平成 9 年(1997 年)出版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20 卷本、平成 11 年(1999 年)出版小岛晋治监修的《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10 卷本,即为这批纪行文的精选本。

二、日本驻华领事系统对中国商情、政治、社会、文化所作的分区调查,日本外务省从明治 14 年(1881 年)起,将领事报告编为《通商汇编》,明治 19 年(1886 年)后改称《通商报告》。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著《汉口》、内田佐和吉著《武汉巷史》之类书籍则是领事系统调查的附带产品。

三、最著声名的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对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东所作的“惯行调查”,其材料已被中外学者广为利用,美籍华裔社会学家黄宗智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研究(中华书局已出版二书中文本),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所著研究华北地区村级结构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王福明译本),主要即依凭满铁调查材料。

四、日军北平情报机关以剪报形式作的中国调查——末次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印行这套资料的中文部分。

五、就调查活动持续时间之长、调查地域分布之广而言,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名列前茅。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以研究中国现状为专务的学校,承袭 19 世纪 80 年代(汉口)乐善堂和 90 年代(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传统,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踏访,从 1901 年开办的第一届起始,每届学生以三个月至半年时间,获得中国政府许可证,数人结为一组,前往中国某地考察,又将见闻整理成“调查旅行报告书”。20 世纪上半叶的 40 余年间(1901—1945 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 5000 人先后参与中国调查,旅行线路 700 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有的还涉足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调查活动,当然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相

关,不少调查活动直接与侵略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行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调查活动所占有的丰富材料,以及所运用的实证方法,却具有参考价值,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干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从中汲取有益营养。

冯天瑜

1999年2月于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5
一、“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5
二、“开国”的力度与主要方向	15
三、幕末的“对清策论”	25
四、以上海为渡航清朝的首选目的地	32
五、四次遣使上海	37
第二章 “千岁丸”——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	43
一、宽永以降不平衡的中日交通	43
二、幕末打开对清交通的努力·“千岁丸”的选购	46
三、“千岁丸”的使命	49
四、“千岁丸”乘员及其上海纪行文	53
五、高杉晋作与五代友厚	62
第三章 初识上海	79
一、长崎启程,千里风涛东海航	79
二、无炮的吴淞炮台·壁垒森严的上海城垣	84
三、中外船舶林立的巨港	90
四、华洋二界比照	99
五、“战败条约”笼罩下的屈辱	108

六、官府的排场与内囊空腐	116
七、“围观文化”	119
第四章 “太平战事”与“清洋会剿”	123
一、幕末日本对太平天国的关注	123
二、炮声隆隆,满目兵戎	131
三、搜集太平战事文献	136
四、着眼曾、李,了解清朝军政格局变迁	139
五、淮军阵营探查	147
六、从“华洋会防”到“华洋会剿”	154
七、“清、倭、英、法共剿”的传说——再析“围观文化”	166
八、洋兵跋扈·藩士质疑清方借洋自保策	168
九、侧面探询太平天国情状	174
十、太平天国否定论及其对近代日本的影响	183
第五章 色彩斑斓的社会风貌	189
一、难民潮涌	189
二、鸦片泛滥	196
三、洋教传播	204
四、洋学译介	209
五、青楼遍布	222
六、民风:淳厚与刁滑	225
第六章 日中贸易的新拓展	229
一、从“居贸易”到“出贸易”	229
二、长崎会所商人及所携日本出口商品	235
三、《道台府应接书》·上海当局对幕府商贸诉求的反应	239
四、藩士们的市场调查及购买蒸汽船的尝试	244

五、运回日本的货物及此行贸易收支	248
第七章 东亚文化圈内的协奏与变奏	252
一、东亚文化圈内涵	252
二、笔语	258
三、书画弈棋交往·古董鉴赏买卖·诗文酬唱应和	264
四、认同与离异	270
五、友谊与摩擦	276
六、日本武士与中国儒生比较	285
结语 “千岁丸”上海行的历史定位	294
一、开 17 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人踏访中国之先河	294
二、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转折的起点	296
附录：“千岁丸”乘员上海纪行文选辑	305
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 刘柏林译	306
日比野辉宽：《赘疣录》 刘柏林译	329
《没鼻笔语》 冯天瑜点校	388
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 皮细庚译	414
高杉晋作：《游清五录：航海日录·上海淹留日录·续航海日录· 外情探索录卷之貳》 李雪梅点校、译	438
后记	466

序 曲

公元1862年6月2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五月五日)^①,上海吴淞口,阴霾笼罩,细雨霏霏,从西南方远处,不时传来闷雷式的炮声。在水天浩茫的扬子江^②出海口,一艘西洋式三桅船鼓帆驶入黄浦江。

与十余年来常常穿梭于此的只挂一国旗帜的西洋船舶不同,这艘帆船高悬三种旗帜:前樯是荷兰三色旗,中樯是英国米字旗,这都是当地人较为熟悉的,而后樯飘扬的白底红玉旗,即使吴淞口一带久历海事者也未曾见过,只有曾经渡航日本长崎的商人才知道,那叫“日章旗”,是日本船舶的标志。^③

在万舸云集、洋舟翩至的上海港,这艘三桅帆船无论就吨位还是就形制而言,都不起眼,但它的到来却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

① 以下,正文用阿拉伯数字记公历年、月、日,括号内以中国数字记中国及日本年号及阴历月、日。一般在日本的活动记日本年号,在中国的活动记清朝年号。

② 长江在江苏仪征、扬州一带古称“扬子江”(因扬子津及扬子县得名),近代外国人通称长江为扬子江,中国人也沿用此说。

③ 日章旗又称“日之丸”,曾是日本船只使用的一种旗帜,1854年(安政元年),江户幕府规定,以其作为“总船印”(识别日本所有船只的标志),自此,日本船舶皆悬日章旗。明治维新后,日章旗作日本帝国国旗用,但并未经过法定程序。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联合国占领军一度禁止悬挂日章旗,但以后日本仍以之作国旗用。1999年8月,日本国会正式通过议案,将“日之丸”法定为日本国国旗,同时将《君之代》法定为日本国歌。

它刚刚在黄浦江靠港，一家英国人办的英文版《奴—斯·卡伊那·海拉尔德》报便派记者登舟采访，获悉此船名“千岁丸”，是江户幕府^①自17世纪初叶形成锁国体制后，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节团乘坐的船只。该报随后发表新闻稿称，坐“千岁丸”访沪的日本武士正演绎一个“传奇物语”（传奇故事），也许预示着日本排外主义国策转变的希望；^②

“千岁丸”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又一表现是，日本人乘员登岸伊始，每至一处，即围观者如堵。造成此等轰动局面，除因日本武士发髻、服装特异，又腰佩双刀，颇令沪上民众讶异外，更重要的是，围绕日本人的来访，上海坊间正流传着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消息与上海紧张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③

“千岁丸”抵沪的1862年夏季，中国，尤其是上海，恰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与清朝间的战争已持续十二年，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双方拉锯地段，太平军正第二次围攻上海，申城内外，战云密布；英法等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由惩膺清朝改变为扶助清朝，以获取更大的殖民主义利益，清军与英法军联手对太平军作战的“中外会防”、“中外会剿”在这一年正式展开，中心地点便在上海；作为《南京条约》规定的对外通商五口之一的上海，因特定的区位优势，经20年开埠，早已超过广州，成为中国第一位外贸港口，

① 幕府：军队出征，使用帐幕，所以中国古代将军署称“幕府”。日本仿此，把12—19世纪武家制度下掌握国家实权的征夷大將軍的府署称“幕府”，先后出现过镰仓幕府（1192—1333）、室町幕府（1338—1573）、江户幕府（1603—1867）。室町幕府因將軍姓足利，又称足利幕府；江户幕府因將軍姓德川，又称德川幕府。

② 详见本书第二章结尾。

③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

而且是东亚最繁盛、最西洋化的大都市,上海正演出着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会的悲喜剧,决定晚清社会命运的重大事件在这里展开……

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1850年8月(道光三十年七月)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又名《北华先驱周报》或《先锋报》)于1863年初发表社论,评议刚刚过去的1862年说:

这显然是中国政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倘若对此一一叙述,那要写成多卷本的书。^①

一周后,该报又载文指出,1862年,全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焦点在上海,或与上海密不可分。上海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舞台。^②

1862年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年初发生“坂下门外之变”,幕府执政的老中安藤信正被水户藩士刺伤,标志着攘夷倒幕之风的炽盛;紧接着,大将军德川家茂与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举行婚仪,时称“和宫下嫁”,这一政治联姻是“公武合体”以平息“倒幕”风潮的不成功尝试;而西南雄藩崛起之势有增无已,长州藩主毛利氏建议改革幕政,又奏请“攘夷”,萨摩藩主监护岛津久光率藩兵入京……。与此同时,幕府开设的研习洋学的蕃书调所改称洋书调所,幕府派出留学生赴欧洲……。总之,这是日本“开国”初期一个充满变数的时段,危机与希望并存。

① 《北华捷报》1863年1月3日。当时英国人站在广州位置上,称上海及长江流域为“北华”、“华北”、“北方”。

② 《北华捷报》1863年1月10日。

在疑云密布的东亚海陆交界处，日本幕府官船“千岁丸”带着怎样的使命，于1862年这个“中国政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来到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焦点”上海？使团的幕府官员（“幕吏”）及随行的诸藩武士（“藩士”），在上海获得了哪些见闻，引发了怎样的思考？这些见闻与思考对日本的幕末维新乃至以后的明治维新起到怎样的作用？在中日两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千岁丸”上海行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随着本书的徐徐展开，笔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探究这些问题。

第一章 日本幕末“开国” 与遣使上海

拍枕海潮来， 勿再闭关眠；
日本桥头水， 直接龙动^①天。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

一、“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

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一大转折便是从分散走向整体，其重要表现和结局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个封闭的国度壁垒森严的门户被打破。

在中世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诸国度，各自分散在孤立的环境中，为了防范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干扰，这些国度不惜“自我幽闭”。如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次下令“禁海”：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廷严禁民人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外贸，1402年（明建文四年），永乐皇帝登基诏书重申海禁，翌年

^① 龙动，即伦敦，英国首都。

(明永乐元年),下令将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无法远航;^① 1645年(清顺治二年),为防范郑成功(1624—1662)从台湾发兵闽浙,取代明廷统治中国的清廷“诏徙沿海居民严海禁”^②, 1661年(顺治十八年)又颁布“迁界令”,禁止一切船舶出海。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1670—?)降清,翌年,清廷废“迁界令”,颁“展海令”,海禁松动,但对外贸易限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口岸,乾隆间更限制在广州一口。雍正间较康熙间进一步放宽海外贸易,却又下令禁止民人私自出洋和久居国外。

与明清时代的中国相比,日本江户时代的“海禁”更为严峻。早在江户时代以前的丰臣秀吉时期(16世纪后期)即开始禁教,德川幕府二代将军以降,为了控制大名、治理民众,竭力垄断贸易,制止西方人带来的天主教不断扩大的影响,1613年(庆长十八年)发布天主教全国禁止令,驱逐天主教传教士,镇压日本信徒;1616年(元和二年)将外贸口岸限定在平户、长崎;1633年(宽永十年)强化始于1604年(庆长四年)的“丝割符制”,限制从明朝输入白丝,以防日本白银过量外流;同年宣布,除官派“奉书船”外,严禁一切日本船只出航海外,曾经在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时期颇为兴盛的朱印船贸易中止。这便进入史称的“锁国”时期。其

① 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的有力支持者。他在发动“宣威海外”的皇家远航的同时,又是民间航海的严厉禁止者。而且,作为帝王某些政治、军事意图产物的“郑和下西洋”,一旦失去倡导者的支撑,也就嘎然而断,无以为继,与几十年后为寻求市场而启动的欧洲人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的世界性远航的一发不可收,形成鲜明对比。

② 王之春:《国朝洋务柔远记》卷一。

实,当时的日本并未使用“锁国”一词,倡导这一政策的新井白石(1657—1725)的用语是“异船御禁止”(禁止外国船往来),近藤守重(1771—1829)的用语是“海禁”(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和走私贸易),幕府屡次下达的禁海命令,也没有“锁国令”名目。“锁国”一词首见于文献,是17世纪来日的德意志人检夫尔(Kämpfer Engelbert, 1651—1716)所著《日本志》所附论文,题目为《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长崎兰学家志筑忠雄于1801年将其译成日文,题为《锁国论》,“锁国”一词始用于此。至19世纪中后叶,当人们意识到幕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是发展的桎梏以后,便普遍用“锁国政策”一词概括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幕府对外方略。^①

1633年至1639年(宽永十年至十六年),幕府五次颁布限制外国船来航、禁止日本船出海的政令(史称“锁国令”),不许日本人同外国人接触,禁止建造大型船舶,日本船不得出海渡航,不准在海外的日本人归国,潜回者处以极刑,除中国、荷兰可在长崎保持有限通商关系(1641年令荷兰商馆从九州西边的平户迁至长崎的出岛),朝鲜可在对马岛进行小型近海贸易外,断绝同其他国家的商贸关系。^②此后,幕府仅依靠荷兰和中国驻长崎商馆向主管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提供的报告书(“风说书”)了解外部世界形势。由担任汉语翻译的唐通事询问入长崎港的唐船船头(货主)后写成的

① 参见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序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参见大熊真:《幕末期东亚外交》,乾元社,昭和十九年十月初版,第16—17页。又参见大庭脩:《江戸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7年7月版,第3页。

报告书,称“唐风说书”^①,亦称“清商口单”;由担任荷兰语翻译的和兰通事询问入长崎港的荷兰商人后写成的报告书,称“和兰风说书”,亦称“阿兰陀风说书”;另外,由担任翻译的通事根据其他外国商人口述译成或摘译外国报纸新闻的报告书称“别段风说书”。这些“风说书”仅供幕府内部阅读,对民众是保密的。不过,幕末“风说书”经翻译者、传递者透露,在各藩国和民间扩散开来,成为各界人士了解域外情状的一大消息来源。日本“开国”以后,“阿兰陀风说书”由荷兰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荷兰总督府的机关志《*Javasche Courant*》取代。1862年(文久二年)起又发行一种十余页的新闻书,名《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用木板印刷,此为日本最早的新闻印刷品。

德川幕府自17世纪30年代实行“锁国”以来,虽在八代将军德川宗吉(1684—1751)执政的享保(1716—1735)、元文(1736—1740)年间对外域文化有所弛禁,但锁国体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锁国两百余年间,日本社会相对平稳,经济较为繁荣,以朱子学为官学的富于日本特色的前近代文化(日本称“近世文化”)臻于成熟。与此前的战国时期相比,德川时期可谓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然而,正当日本人闭门做着“太平梦”的时候,遥远的欧洲发生着影响全世界的大变革——14、15世纪初萌于南欧的资本主义,到17、18世纪(德川幕府前中期)在西欧有了长足进展,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实现工业革命,法、美等国紧随其后,资本

①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国”,称中国船为“唐船”。其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对唐朝有深刻印象,故以“唐”指代中国;二是郑成功由不屈从清朝的明人意识出发,称自己是唐王(朱聿键)属下的唐人,这一称谓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人颇有影响。后说参见大庭脩:《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17页。